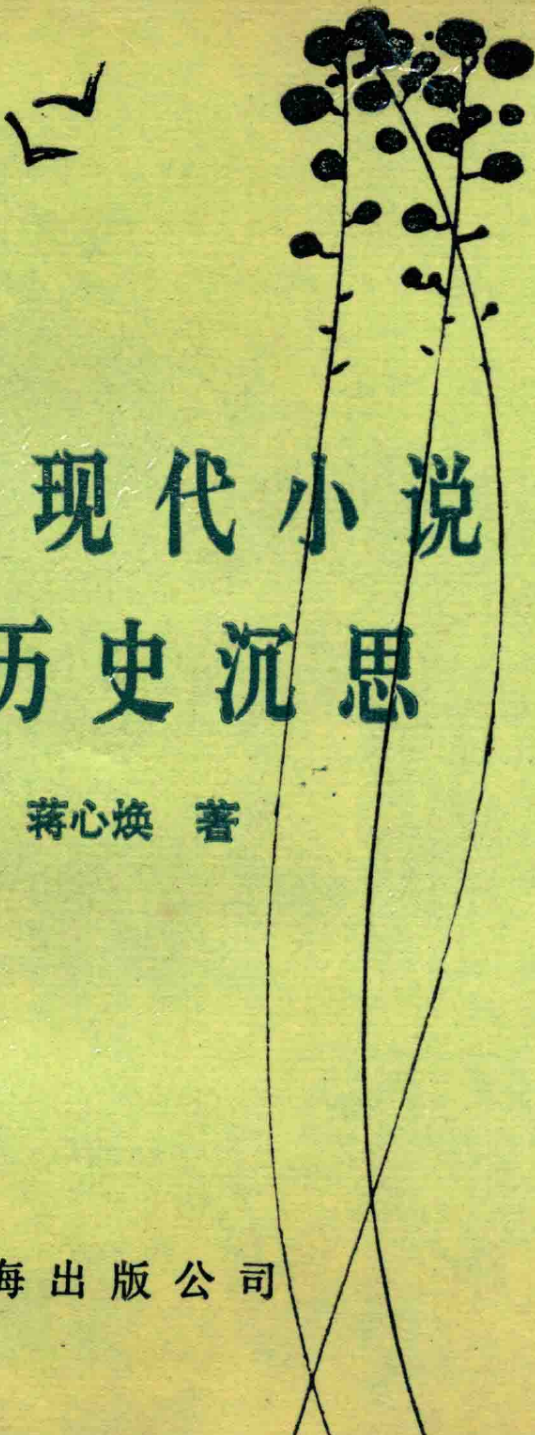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 的历史沉思

蒋心焕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山东评论家丛书

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

蒋心焕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01号



· 山东评论家丛书 ·

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

作者	蒋心焕
责任编辑	王 谦
封面设计	卢世健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印刷	武警山东总队后勤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6.25
字数	157千字
版次	1993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书号	ISBN7—5442—0119—8/G·51
定价	5.20元

(版权所有 · 盗印必究)

序

蒋心焕教授生长在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物丰人寿的鱼米之乡的南通市。可是他大学的教育却是跑到黄河岸边的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山东师范学院来完成的。在抗战以前，齐鲁大地受尽了封建军阀的剥削与压迫，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齐鲁的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奉献上全部所有以至生命。因而，山东所受战争的损害最重大，形成了一片片断垣残壁，一片片满目荒凉。蒋心焕教授作为高考新生，是50年代到的济南，虽然那时比起刚胜利后已经好些了，但各种条件，如居住、饮食、学习，比起江浙等省仍相距甚远。只就饮食说，每人的伙食仍有部分杂粮以至红薯。饮食的改变，不仅是个思想问题，主要的还是生理适应，得有一个过程。记得20年代末我从山东转学到上海，由于改食米饭，肠胃经过半年多才适应了。学校是新建的一所学校，各方面当然难以同老校相比。但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学业，并以成绩优异，留在原系任教，他一直在现代文学教研室，通过漫长的岁月，从助教逐步提升为正教授，这是30多年，近40年的他的历程。在这近40年中，他的青春年华完全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中。这40年不是平静的40年，在前17年中，可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革”10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身上生鳞、头上长角的“革命英雄”，在每次运动中，就好像出英雄的乱世似的，也总是跳出几条英雄好汉。可惜这些英雄一般都英名不长，是昙花一现

的人物。批武训传，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丁陈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仅在历次出现的，昙花一现的英雄中，从来不论是学习时期的学生还是毕业后成为教师的蒋心焕，都难以看到他的影子，也没看到他的文章。

在平日备课的讨论中，无论对于老教师，或比他年轻的教师，他都是诚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心平气和地与人商讨。在教课中他关心学生的学习，关心学生的进步，也关心学生的生活。这40年来，他一直潜心地学习，潜心地工作，居于一个平凡的位子上，从不想借机取得个人的利益，更不会以人为梯企图爬向高处，或只顾自己冒尖，置他人于不顾。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没有精心钻研，并不是没有什么心得与见解。他是在默默地勤奋地力争最好地完成自己的科研与教学任务。“文革”后，各校编撰教材，在全国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编得最多的一种，有的几个学校联合编写，有的几省联合编撰。我们山东四院校联合编写的一本，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出版较早的一本，也是引起港台及日本学者关注的一本。接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又编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两本书中，蒋心焕教授都分编了重要的篇章，并保质保量地完成。其后又编辑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第三个十年”的《散文杂文卷》，是他和另外二人合编的，早已交出版社，即将出版。另外蒋心焕教授两本即将出版的书稿，一本是关于美学的，另一本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这本书可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长篇，就中国现代小说中某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作者选择的问题，可以说有的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尚未引起人们或尚不够注意的某些问题，如《试论左翼文学的工人题材小说及其得失》。30年代的左联即提出了写工农的问题，1942年在《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工农兵的方向。写工农兵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的方向，作者当然是在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提出进行考察的。又如作者论述了梁启超，郁达夫的小说观，也阐述了近代文学

转换为现代文学问题。这都是一般现代文学史上很少论及的问题，这些问题弄明白了，对于研讨文学史自然是极有意义的。

除了这一部分外，第二部分是分为3个10年，论列了自己所见的各个特点。第三部分则论述了丁玲、赵树理、蒋光慈等五个作家。这五个作家在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前面二人外，一般占的篇幅不多，虽然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里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并不是人云亦云的重复。

前一部分是史观史论，后两部分则是史实的分析，无论前者或是后者，都反映了作者的具有个性的见解。我觉作者整个说来是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历史是应该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史的可贵处并不是追求文字华丽，更不是写得热闹。而是忠于史实，不夸大，不缩小，不粉饰，不歪曲。作者的风格从来就是守真守朴。这就是本书的可贵处。所谓信史，就是这个意思。

田仲济 写于1993年4月

目 录

序.....	田仲济(1)
“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	(1)
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	(14)
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25)
试论郁达夫的小说观	(35)
试论左翼文学的工人题材小说及其得失	(45)
现代“黄河文学”论	(61)
蓓蕾初绽 异彩灿烂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	(97)
试论 1927—1937 年的历史小说创作	(109)
略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小说.....	(126)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	
——评鲁迅的《故事新编》	(136)
评蒋光慈的小说创作.....	(149)
漫话叶紫的小说创作.....	(156)
评耶林的短篇小说及其主要特色.....	(160)
丁玲的小说创作.....	(169)
试论赵树理的小说.....	(180)
后 记.....	(193)

“五四”新小说理论和 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

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解放以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诸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等，都注意到五四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关系及时代思潮同文学变革的关系，但这些史著，由于所论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的缘故，大都只提出了问题，未能展开论证；有的论著，或立论失之偏颇，或资料明显荒缺。虽然有好多问题留下空白，但先驱者的起步却是可贵的。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研究工作者以新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这个专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沙似鹏的《五四小说理论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关系》等专论，对进一步研讨这个专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本文拟就此专题有关的两个问题，即如何评价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和现代小说理论对近代小说理论的革新，谈点零星的想法。

（一）

评论界对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少，但我觉得从理论的整体上进行评价的文章并不多，且往往有偏高的倾向，如为说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差不多都说，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为五四新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看法缺乏必要的分析，也不符合小说演变的实际，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探讨。

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若归类作平行分析,确实是触及到好些方面的问题,比如小说的真实性、小说的功利观、小说的艺术特点等,但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更值得评论者去探求。简单说来,它的核心,或它的本质,乃是视小说为政治工具,小说具有万能的社会之力。梁启超多次强调了 this 意思,1897年,他论及日本变法时,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1902年,更为明确、系统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在梁启超的极力鼓吹和影响下,继起的一些论文,如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天僊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等,更是把小说的作用夸大到极限,说什么:“小说势力之伟大,几几乎能造成世界矣。”③“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④“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⑤诚然,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涉及到文艺的真实性,文艺的美感作用,文艺的功利观等,也可以说,他的小说理论是自成体系的,但问题在他未能科学地论述真实、美感和功利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忽略了文学的第一要义是真实,把文艺的功利性抬高到很不恰当的地位;他从读者乐意接受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小说的特征具有四种力量:“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⑥但梁启超在论述小说美感性时,一是没有强调美感性对真实性的依赖关系;二是忽略美感作用相对的独立性,把美感仅仅看作是从属功利观的附属。他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论及“四种力量”的。所以,他不无偏激地指出:“文学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

惟小说。”⑦

从上述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两个基本认识:就社会目的看,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仅仅是为了“新民”的政治需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他翻译的著名小说《佳人奇遇》以及他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梁启超等人,在寻求其“新民”途径之中,发现小说乃是一“简易之法”,可以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⑧,从而达到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理想的目的。

就思想基础说,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梁启超等人颠倒了社会存在和思想意识的关系,把小说作用夸大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这就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当时就有人清醒地指出:“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中个别人对文艺作用的说法,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唯心主义估量。鲁迅尖锐地指出:“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扇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⑩

以上所议,是否对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有肯定不足,怀疑有余之嫌呢?没有。上面仅是从小说理论的总体上进行了分析,若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国自来小说不入史,“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⑪,“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⑫这个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的出现当时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无疑是晴天的一声霹雳。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初指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同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不是一回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虽出现了“小说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的记载,但班固仍认为小说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者之所造”，“其语浅薄”，“迂诞依托”，并断言这是一种“君子弗为”的“小道”。他虽然在《诸子略》中著录了小说家，但将其列入“诸子十家”之尾，并且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班固鄙薄小说，不言而明。这里须指出，班固所规范、指定的“小说”，同以后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从文学体裁上规定的小说，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他们对小说所取的鄙视态度则是相同的。鲁迅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⑬这种“成见”一直延续到清代，基本上无甚变化。“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戈戈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⑭在全部意识形态中，把小说视作“鄙且陋”的偏见，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面临着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梁启超等人登高一呼，呼吁“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提到文学之中最“上乘”的地位，认为小说可以新国，新民，新一切，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在历史变革中是屡见不鲜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一出现，在当时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这影响也延伸到五四前后。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信中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命，必数及梁先生。”^⑮钱玄同的这个看法，是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实际的，五四新小说正是以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作为起步而向前发展的。

(二)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在前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发生、变革都有其承前启后的继承关系。恩格斯曾多次说过,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⑥}。五四新文学,固然主要是摄取了异域文学的各种养料而勃兴起来,但它并没有脱离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优良传统,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力量,是任何外来力量都隔不断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⑦}以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文学为号召的五四新文学,同样未能摆脱先辈们传下来的反封建文学的优良传统。

五四新小说和近代小说的关系也是如此观。一方面,五四新小说理论是以近代小说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料和由以出发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五四新小说和近代小说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它们所服务的时代要求不同,特别是五四以后由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带来了指导思想的不同,这样,它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性,又有区别性。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主要侧重于前者进行了论述,这里我想着重于后者谈几点认识。

一、小说和群众的关系 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都强调开发民智,深深地打上启蒙主义的烙印。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就是以“新民”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其欲

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⑧}梁启超的“新民之道”包括好多方面的途径，“小说界革命”无疑是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不能否认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新民”和“群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要指出他的“新民”论的局限性。梁启超等人当时代表着中国的“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①⑨}的阶级利益，在政治思想上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②⑩}就是说，一方面，梁启超努力吸取了西方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对代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与之彻底决裂；或者说，民主主义只是他的一层外壳，而内里为主的还是封建主义。这就决定了“新民”说的不彻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教化民众”。而“五四”新小说理论和创作，则是建立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其目的在真正的唤醒民众，使之在思想上摆脱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茅盾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高出于同时代人者，正在于此。他热情呼吁“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同时，“又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们心中”^{②⑪}这样一种文学出现。无疑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具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新型的文学。鲁迅小说创作的启蒙主义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揭露上层社会的堕落，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从而“利用他（指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⑫}而且深入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思想深处，剔发人们的精神弱点和灵魂创伤，从而“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②⑬}这就使鲁迅的小说高出同时代小说家的作品。当时为数不少的小说，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描写了劳动者啼饥号寒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而鲁迅不止于此，他集中剖析了劳动人民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他对劳动者所表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的感情也就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因而他的小说创

作在“五四”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中发挥了极有力的战斗作用。

二、科学化、现代化的新小说观念的初步建立 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都注重从异邦求新声,从传统吸营养,但其态度和方法有高下之分,其发展趋向是小说的科学化、现代化特征愈益显明。

一是为短篇小说正名。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中,把小说和史籍,小说和图画等加以区别,这样的文字并不少见,但什么是小说?小说的完整形态如何表述?当时的理论文章就比较少,且显得简单、空泛。比如,有的说:“小说者,社会之X光线也。”^{②4}有的说:“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②5}有的说:“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②6}有的说:“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②7}这些说法各执一端,虽不无可取,但都未道出小说的应有要义。五四前后出现的文章,则有明显的进展,1918年胡适发表的《论短篇小说》是一篇重要的专论。胡适认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个定义基本上揭示了短篇小说的特点,同时也接触到文学的典型化问题。胡适还针对当时新、旧小说家不重视结构、布局的缺点,强调指出:“‘短篇小说’是有结构局势的;是用全副气力贯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实上的。”他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说得更明白:“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在这里,他强调了结构对表达内容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结构和内容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稍后,茅盾以更科学、准确的语言,论述了小说的本质特征:“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人;书中情节可以简至仅是一段回忆。”^{②8}与小说正名有关

联的,五四小说理论比之近代小说理论,还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小说概念净化了,以往总是把小说和戏曲等民间形式相混,五四时期则明确把小说和戏曲分开,统统归入文学之林;二是小说表现的范围扩展了,梁启超等人强调小说描写时事,抒发政治理想,而五四时期的小说,则进一步扩展到生命、人生、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是小说从以“教化”为中心思想观念向以真善美为中心审美观念的逐步过渡和转化。如前所述,近代小说理论,偏重于功利这个主要层次上,而五四新小说理论则在真、善、美几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的要求。它十分强调小说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要求小说为人生,为社会,并改良这人生和社会,要求小说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变革和创新,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五四前后,各种流派的小说作家,不同程度的几乎都触及到这个问题。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说:“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真实。”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中,茅盾就表述得格外清楚:“我以为创作文艺,有三种功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观察,(二)是艺术,(三)是哲理。……三者之中,(二)最难;这是和‘天才’有关的。”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对真善美关系的认识,茅盾和周作人,从不尽相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语言,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傅斯年的《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虽是从整个白话文学的改革立论的,但也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所谓真白话文学,必须包含三种质素:第一,用白话做材料;第二,有精工的技术;第三,有公正的主义;三者缺一不可。……俄国在近代文学界中放了个大异彩,一半由于他的艺术,一半由于他的主义。……艺术而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傅斯年更加强调了艺术,即美方面的要求。另外,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叶绍钧在《创作的要素》等文中对真、善、美也各有侧重地作了论述。

我们引证了上面好多人的看法,意在说明五四小说理论对审

美的要求是自觉的,而且不限在一个层次上。同时,也应指出,在真、善、美三者结合上,理论论述是较为完整的,而在创作实践上则体现不够。初期白话小说,除鲁迅一开手创作就趋向成熟外,其他的小说佳作不是没有,但大多数是处在探索和逐步走向成熟之中。就拿《新潮》杂志初期发表的小说来说,幼稚之作仍不少。正像鲁迅对其中某些小说所批评的那样:“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②9}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五四新小说理论可以从西方得到借鉴,而植根在现实生活土壤中的新小说创作可借鉴的东西不多。再有,作家对小说艺术的驾轻就熟,需要有一个探索再探索的过程。而很多新文学家的功底不深厚也是一个原因。

三是小说从主要以写故事为主向主要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态为主的逐步演变。中国古典小说,从唐传奇(鲁迅说:“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③0})而宋话本,而明清讲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即它们多以编织故事情节为主,其情节往往具有传奇性、曲折性、戏剧性、连贯性等特点。当然,我们无意于否定其中一些佳作名篇也刻画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塑造已达到性格典型化的程度,如《莺莺传》中的莺莺,《李娃传》中的李娃等。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达到个性化、典型化的程度,除了作家的艺术本领外,也与这些作品情节的真实、生动是密不可分的。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问世,作家们才把注意力移向人物性格的刻画。近代小说,数量虽以千万计,但真正可观者只有若干部,基本上未突破以写事为主的传统框架。五四前夕,《新青年》几个主要撰稿者,以书信的形式,对几部古典优秀小说和几部近代谴责小说,在《新青年》上展开热烈的争鸣和探讨。其中有一点,就是通过优劣之比较,肯定了这几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五四以后,小说评论出现了

新的趋向,即对以叙事为主的作品有所淡化,而对以写人的心态、性格为主的作品则作了极力强调。胡适说:“《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说:“其重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这个时期,探讨小说理论的文字,几乎都是围绕着“人的文学,才是真的文学”这个命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印证发挥。胡适认为,小说描写的方法中第一条就是“写人”,而且,“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④。茅盾强调,必须通过典型化方法,写人的动作和心理,以揭示社会人生的要义。他说:“须知真艺术家的本领即在能够从许多动作中拣出一个紧要的来描写一下,以表现那人的内心活动,这样写在纸上的一段人生,才有艺术的价值,才算是艺术品!”^⑤叶绍钧在《创作的要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郁达夫在《小说论》中更是把塑造人物形象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这‘典型的’*типичный* 三字,在小说的人物创造上,最要留意……是小说家创造人物最难之点,也是成功失败的最大关头。”在小说描写对象问题上的演变,同五四时代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磅礴突进的思潮密切关联,同五四文化巨子善于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密切关联。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思潮,归根结蒂一句话,是焕发了长期被封建思想窒息了的人的尊严、个性和价值!肯定人的本质,张扬人的个性,形成文学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汇成文学的洋洋大观。尼采哲学和西方美学思潮的引进,更助成了这股潮流!近代小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最终未能冲破固有传统的框架,这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

四是小说作者由重视认识、感受生活到初步认识到确立正确人生观的重大演变。近代小说理论中,不少人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